

初论官员道德的若干问题

顾建亚

(杭州应用工程技术学院 信电系 杭州 310012)

摘 要 柏拉图,马克思和邓小平在不同时代,从不同角度对官员道德问题作了深刻研究和精辟阐述,这些思想和理论对于我国 21 世纪的官员道德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柏拉图 马克思 邓小平 官员道德

中图分类号 B822.9

马克思在批判地吸收了前人的优秀成果,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政权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无产阶级的官德理论,提出了社会公仆思想及权力监督构思.这一理论,对于今天建立一支合格的公仆队伍,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在世纪之交的新时期,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 20 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共产党员尤其是广大领导干部的官德问题空前严峻.邓小平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提出了“为人民谋利益”的服务理论以及“两手抓”等一系列思想和措施,直接指导和推动了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的发展.

1 柏拉图认为公正、正义、廉洁、节制、为民是官吏的必备之法

柏拉图在他的系列著作中对官吏道德思想的内容作了详细的阐述.他提出应由少数“理性”和“智慧”的哲学家来担任国家的统治者和管理者,委任官员应以知识、德性等“美德”为标准.他认为“可以在一个真正善的城邦护卫者天性里把爱好智慧和刚烈、敏捷、有力这些品质结合起来了”.^[1]柏拉图又认为公正、正义、廉洁、节制是官吏的必备之德.他描绘“理想国”中官吏都是些有公正心、正义感的人.古希腊的官吏是不受薪的.柏拉图认为,作为国家的统治者、管理者、官吏应该生活简朴,以便富于绝对无私精神.他认为,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以外,官吏不得有任何私产.因为“他们已经从神明处得到了金银藏于心灵深处,他们更不需要人世间的金银了”.^[1]“因为世俗的金银是罪恶之源,心灵深处的金银是纯洁无暇的至宝”.^[1]柏拉图认为如果官吏有了私产,就会不安心搞政治,就会蜕变,引起人民不满,结果就会是,“他们和国家一起走上灭亡之路,同归于尽.”^[1]官吏应以整个国家利益为重.柏拉图认为建立“理想国”的目标“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1]“必须寻找坚持原则孜孜不倦为他们所认为的国家利益服务的那些护

卫者。”^[1]选择那些“最鞠躬尽瘁,为国家利益效劳,而绝不愿做任何不利于国家的事情的人。”^[1]古希腊十分推崇法治思想,官吏是否有“美德”、守法是一个重要标准。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里也强调了官吏守法的重要性,他指出,人类不仅要有法律,而且要遵守法律;法律不仅要求一般人遵守,它也应该高于官吏的权力之上,统治者、官吏必须以身作则、严明律己,服从法律,国家才有希望。柏拉图还进一步提出,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以具有知识、德性和守法等良好素质为被选举条件。

柏拉图所阐述的古希腊官吏道德思想中一些基本观念,如公平、正义、利他、克己、廉洁、为民等,都具有永恒的价值。但他的官德思想是奴隶主阶级的道德生活在官吏阶层身上的反映,是为巩固奴隶主阶级利益服务的。虽在某些方面反映了时代的某些现状,但仍不过是乌托邦而已。

2 马克思指出国家公职人员是人民公仆

无论是奴隶制、封建制还是在资本主义下,作为剥削阶级代言人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官德思想都无非是为了维护本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政权的稳定。只有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批判地吸收了人类思想史上的官德思想,在变革社会、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创立了无产阶级掌有政权,并为广大劳动人民谋求共同幸福的历史上最科学最先进的无产阶级官德理论。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过来,交给社会负责的公仆……,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2]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国家公职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公仆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马克思还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2]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自己新型的专政和民主,这是国家的性质所在,也是公仆最根本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新的政权形式与以往国家的区别在于,它可以凭借自己的功能来保证和防范腐败的发生。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发挥党组织的公仆作用和防止党的蜕化变质问题,强调应在党内发扬民主作用,反对党的领导干部在党内搞个人专权和独裁。亲自为工人阶级政党制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科学的党章、党纲,并且要求党员“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2]。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根本改变国家、国家机关的社会主人状况,使之成为社会的公仆,已是无产阶级的一项光荣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强调,代表无产阶级及其广大人民利益的国家政权机关应是“廉洁政府”。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国家群众团体的组织领导机关的公职人员应是人民勤务员的观点。认为这些领导组织和机关的公职人员只是作为人民群众中普通的一员而占有社会生产资料,他们同广大群众之间是同志式的分工合作的关系。尽管其具有不同于普通群众的工作职能,并根据社会分配原则取得人民所给予的一定报酬,但其根本利益则是和群众一致的。他们是人民群众中的一部分,是来自于群众并为群众服务的勤务员。马克思还强调无产阶级应“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2]怎样才能使公职人员成为好的人民勤务员呢?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公职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素质条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着重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者应具备的素质和条件,要求党的负责人除必须具备党章所规定的党员条件外,还必须具备更好的素质。对此,恩格斯曾指出:“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当兵作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部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 and 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斗行列中”^[2]。恩格斯的这一光辉论述,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条件。

为了防止人民勤务员的蜕化变质,马克思恩格斯还特别强调应制订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他们

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政权应坚持“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2]具体地讲,应“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2]。“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2]在这里马克思概括了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即真正的民主,全民普选,勤务员对全体选民负责,并根据人民的意志随时可以撤换,以及人民监督和低薪制等等是新政权反腐败的有效方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反腐败的官德理论的最初表达。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了监督和随时撤换的思想,在他们看来,人民群众掌握监督罢免权是巩固工人阶级统治的根本措施,是工人阶级能否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头等大事。

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成功地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官德理论在实践中证实了自己的正确性和普遍性。列宁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光辉思想,认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中工农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为防止国家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转为社会主人,列宁反复强调要在苏维埃政权中建立一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网络型监督结构体系。在列宁鸿篇巨帙的著作中,蕴含的权力监督思想相当丰富,特别是关于党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法律监督的思想,至今仍值得我们弘扬和借鉴。

3 为人民谋利益是邓小平官德思想核心

在这千年之变的新时期,中国的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尽管在思想观念,工作内容,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和具体要求较列宁时代有很大的不同,但最深沉的本质,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本质仍然未变。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干部道德建设,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结合党的建设和干部思想建设的实际,对干部道德有许多重要的论述,对我国干部道德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许多官员在唯经济主义的感召下,只注重如何当好一个经济建设的带头兵,却无法清醒地明确怎样做一个勤务兵和“道德人”。邓小平曾焦虑地指出,干部中脱离群众、思想僵化、滥用职权、办事拖拉、互相推诿、抑制民主、循私行贿、贪脏枉法等现象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邓小平在继承和发扬马、恩、列、毛的官德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构建了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官德建设的思想体系,其内容十分丰富。

在1986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指出:“在我们社会的各行各业,都要大力加强职业道德建设。首先是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要公正廉洁、忠诚、积极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对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利用职权谋取私利。”邓小平还赋予人民公仆理论新的时代内涵,更进一步强调要把为人民谋利益,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作为社会主义公仆的工作宗旨和最高准则。可以说,为人民谋利益是邓小平官德思想的核心。邓小平曾提醒各级政府部门想一想:“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4]“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力。”^[4]只有如此,将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才能实现人民最大最根本的利益。也就是说,要将“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作为检查政府官员工作的重要标准,甘心做人民的勤务员,将人民利益作为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把是否能够为人民谋利益、代表人民的利益,作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重要表现。邓小平在干部考核标准上,更是从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简捷地概括道:“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4]又进一步谈到,“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就谈不上是红。”^[4]这两段话,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无论是德还是才,都要体现在为人民利益服务之上,我们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去选拔考核干部,

也就是坚持了干部在思想建设和业务工作中树立为人民谋利益这一基本原则。

邓小平还提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的“两手抓”理论。“我们要反对腐败,我们前进的步伐会更稳健、更扎实、更快。”^[5]为此,他强调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党性锻炼。“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5]“对大多数党员来说,是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性,要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精神状态上有显著的进步,党员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的觉悟有显著的改善。”^[5]邓小平还指出,“党和政府愈是实现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4]

此外,邓小平关于干部道德建设的思想还包括改革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不能让权力集中于领导一个人手中失去监督和控制;精简机构,转变工作作风,改变办事效率低下,无人负责的现象。邓小平说,“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那种只靠发指示,说空话过日子的坏作风,一定要转变过来。”^[5]健全民主与法制,确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5]“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法制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4]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身体力行。

自1980年以来党和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决议、条例和规定,引导干部认真实践干部道德,开始了干部道德法规化的进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干部道德建设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一系列决议、规定和条例中都对干部道德(官德)的原则和规范提出了明确要求:忠于国家、秉公办事;不谋私利;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等等。而且明确规定,党组织和党员违反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应当给予党政处分的,必须受到追究,触犯法律的要受到法律制裁。实践证明,这些法规对规范领导干部的行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维护了党的纪律和干部道德的严肃性。

4 加强社会主义官德建设

在当前,干部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腐败。虽然反腐败的工作几年来一直未松懈,但腐败现象可以说屡禁不止,关键是要把决心和口号落实在行动上,要扎扎实实地做几件大事,要常抓不懈。

4.1 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加强“德性”“理性”和“党性”教育,这是社会主义官德建设的基础。

古人有“为政以德”“唯德是辅”“德在人先,利在人后”之说,足见古人对“官德”之重视。江泽民同志指出:“领导干部首先要堂堂正正做人。”怎样做人?最基本的是讲道德,做有道德的高尚的人,离开“德性”这一基础,做党性强的人,做好党员、好公仆就无从谈起。那些腐化堕落违法犯罪的党员干部,都是从放松自我改造、自我修养开始的。因此,搞好廉政建设,必须抓住党员干部品德修养这个根本,正本才能清源,源清才能流洁。领导干部还要注重理论与文化知识的学习,以理性促德性。毛泽东早年就指出,学习知识,其一,可帮助人建立信仰,其二,可指导人正确行动,其三,可帮助人改正不良习惯。人的一些不良习惯是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克己与修养”等途径达到改正之目的。

4.2 加强以法律为核心的制度建设,这是社会主义官德建设的有力保障。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最为匮乏的是“法律主治”的制度传统,只有人治和德治的传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虽然并不缺少对官员的道德教育,但一部分官员依然在利益驱动下超越了官德的戒律。因此,完善以法律为核心的正式制度,并通过相应的制度建设,才能给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

官德建设提供重要保证。也就是,将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某些道德规范法律化,通过法律的强制手段和威慑作用以护卫社会主义公务员队伍和公务员道德的纯洁性。另外,必须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要规范一些必要的制度,规章制度一经建立,就应该具有严格的约束力,任何党员不管地位、职务多高,都不得违反。

4.3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这是社会主义官德建设的关键。

真正体现人民民主及完善权力制衡和人民监督机制,要勇于吸收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比如可借鉴资本主义民主体制中成功的一面。关键是要健全公共权力主体的制约机制。从政治学视角看,领导干部是公共权力主体。有效反腐败关键是要对公共权力主体的产生、更替有严格的制约,要实现对公共权力主体制约的经常化、制度化,并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机关组织、机构、体制以及这些组织、机构、体制运作的程序和规则。

4.4 加快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官德建设的根本。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道德背后的基础是利益,是实实在在的利害关系,不仅仅是某种主观的善良愿望。那种“纯粹人”的追求始终只能是道德“乌托邦”。落后的社会存在决定了落后的社会意识。刘少奇认为,腐败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不够。因此,他认为“发展经济是一切斗争的终极目标”,也是为清除不正之风创造必要的客观条件。反腐败斗争同经济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唯物史观又认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社会意识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所以,对腐败现象不重视或回避都是不可取的。总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大力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后与贫穷,是反腐败和官僚主义的最终条件。

参 考 文 献

- 1 柏拉图著.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馆出版,1986.69,130,131,133,126,125
- 2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34,376,414,382,335,375,335
- 3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3,270
- 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8,146,151,282,367
- 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8,85,121,306,327

About official morals

Gu Jianya

(Hangzhou Institute of Applied Engineering, Hangzhou 310012)

Abstract In different eras and from different angles, Platon, Marx, and Deng Xiaoping have made deep research and wonderful elaboration about official morals. Those thoughts and theories have great guiding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constructing official morals of our country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Platon Marx Deng Xiaoping official morals